

古书版本鉴定

李致忠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编辑：许晓东

古书版本鉴定

李致忠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新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开 印张：12

1997年2月第一版 1998年2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5010-0913-9/K·397 定价：50.00元

目次

小引	1
----------	---

上：史 证 编

一、书籍、书籍形态和书史的主要内容	3
二、中国书籍的产生、初兴与发展	6
三、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9
(一) 书籍的生产材料	9
1. 纸书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材料	9
2. 纸书的出现与流行	14
(二) 书籍的生产方法	17
1. 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18
2. 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20
3. 活字排版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23
(1) 泥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	23
(2) 木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	27
(3) 铜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	30
4. 套版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33
四、书籍的装帧艺术	38
(一) 古代书籍的版面设计	38
(二) 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	41

(三) 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	51
1. 简策	51
2. 帛书卷子装	53
3. 纸书卷轴装	53
4. 经折装	55
5. 梵夹装	56
6. 旋风装	59
7. 蝴蝶装	61
8. 包背装	62
9. 线 装	63
10. 毛 装	65

中：版 本 编

一、版本之称	67
二、版本学之称	70
三、版本学功用	76
四、善本之称	83
五、版本类型与版本称谓	88
六、版本造伪与辨伪	101
(一) 以残书充全书	101
(二) 以丛书零种冒充单刻	103
(三) 伪改书名、作者以充罕见之书	103
(四) 增删刻书牌记以冒充珍本善本	104
(五) 增删刻书年款以冒充珍本善本	105
(六) 挖改序跋紧要处或改换序跋以充善本	106
(七) 伪造伪钤名家藏书印鉴以抬高版本身价	106
(八) 染纸造蛙以充古刻旧抄	108
(九) 以真带假版本杂拼	108
(一〇) 装帧造伪以充古刻旧刊	109

下：鉴 定 编

一、一般刻本书的鉴定	110
(一) 依据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110
1. 宋代刻书的特点	111
2. 元代刻书的特点	114
3. 明代刻书的特点	116
4. 清代刻书的特点	119
(二) 依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122
(三) 依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126
(四) 依据后人题跋识语鉴定版本	131
(五) 依据原书刻工鉴定版本	136
(六) 依据书中讳字鉴定版本	140
(七) 依据地理建置沿革鉴定版本	144
(八) 依据机构职官变迁鉴定版本	146
(九) 依据衔名尊称谥号鉴定版本	150
(一〇) 依据书名冠词称谓鉴定版本	153
(一一) 依据卷端上下题名鉴定版本	156
(一二) 依据卷数变迁鉴定版本	159
(一三) 依据藏书印记间接鉴定版本	162
(一四) 依据著录鉴定版本	165
(一五) 依据原书内容鉴定版本	168
二、活字印本书的鉴定	172
(一) 依据序、跋、牌记鉴别	172
(二) 依据边栏界行衔接处的迹象鉴别	173
(三) 依据有无断版迹象鉴别	174
(四) 依据行字疏密、歪斜、横置、倒置鉴别	176
(五) 依据印纸墨色的浓淡是否均匀鉴别	176
三、抄写本书的鉴定	177
(一) 依据书体的风格特点鉴定	177

(二) 依据题跋识语鉴定	179
(三) 依据室名斋号及稿纸特征鉴定	179

小 引

这本书自己命名为《古书版本鉴定》，即首先是讲鉴定的。讲什么鉴定？讲古物鉴定，还是讲书画鉴定？都不是，是讲版本鉴定的。版本，是书皆有版本问题。是讲新书版本，还是讲外国书的版本？也都不是，是专讲古书版本的。古书，哪国都有，是讲外国的，还是讲中国的？当然是讲中国的。这样合起来，此书的范围就界定了，就是专谈中国古书版本鉴定的。

鉴定是个过程，是调动鉴定者各方面知识，从各方面下手，综合各方面依据，最后做出判断的过程。因此，在谈鉴定之前，应该对书及书的版本等紧密相关的问题做个基本的交代。

书既是社会的精神产品，也是社会的物质产品。从精神产品的角度说，它有意识形态；从物质产品的角度说，它又有物质形态。两种形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书籍。所以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人的思维、意识、知识、学问一经文字予以表达，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有个载体问题。而材料有自然的形态，有加工过的形态，这些形态又决定着版面形态。而若干版面形态有序地集合在一起，装订在一起，就又有了书籍的形态。所有这些关于书籍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虽属书籍发展史要讲解的问题，与版本鉴定似无直接关系，但版本鉴定所需要的许多知识，特别是跟书籍自身有关的那些知识，都是有来龙去脉的，都是有发展演变过程的。对书籍本身的有关知识不预做交代，鉴定时见到一些现象就会盲无所知，就会使时代特征、考订证据失之交臂，鉴定也会说不出根脉。所以本书一开头便讲书史，好像是离题较远，实际是从源头铺垫，以利学海行舟，故先有史证编。

书史问题交代了，接着来的就是版本问题。什么是“本”，什么是版本，什么是善本，什么是版本学，版本学功用等等，都不是尽人皆知的。即或是知者，由于所从事的专业不同，志趣不同，也未必洞晓。即或是洞晓者，也未必对这当中的异同歧见、源流派脉有兴趣去深究。所以在史证编之后，紧接着就列版本编，旨在交代有关版本方面的知识，

以期为本版本鉴定做中流疏浚。

鉴定编则是本书的主题，也是古书版本鉴定的落脚点。这一编围绕中国古书的雕版印制、活字排版印制、抄写复制等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由这些生产方式所赋予书籍的不同特点等，展开叙述。这些叙述有前人的经验，也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虽窃意将自己所知全部奉献，但绝不敢说已包罗殆尽。实际是知识越丰富，鉴定越自如；见书越多就越知其个性，越知其个性就越容易归纳出共性。所以我那鉴定版本的十几条，只是提示门径，绝不可奉为圭臬。况且鉴定出版刻的人时地、抄写的人时地，也只是版本鉴定的初步完成，远未解决版本系统、版本源流、版刻优劣等更本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数本，丹黄手校，潜心勘比，才能分出源流系统和善本劣本。这些都应是版本鉴定中的内容，岂是仅知版印人时地、抄写人时地所能包容！

孟宪钧出于编辑人员的天职和自身的见地，极力促我写一本关于古书版本鉴定的书，以与其整体构想的书画鉴定、青铜器鉴定、瓷器鉴定等配套，成一套鉴定丛书。我临事而惧，屡屡坚辞而不获命，故冒昧写下了这本书。拙稿若有瑕疵谬误，责任当由我负。若获方家学者认同，并有益于人事，则吾之大幸。

李致忠

1994年8月21日于北京

上： 史证编

国有国史，地有地志，家有家乘，学科有学科史，书籍也有自己发展演变的轨迹。琢玉成器，观古知今，知前证后，向为史家和学问家尊奉为必循的规律。书籍也称载籍、典籍，其实细分，这三者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好在本书的重点是要谈古籍的版本鉴定，所以对典籍、载籍、书籍的确切含义，也就无需详加考辨了。不过既是谈书籍的版本鉴定，对书籍的有关知识、历史演变、承继关系、发展脉络等，似乎也应有所了解。否则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版本鉴定也很难做到准确、科学和深入，是为史证编。史证者，从书史的角度鉴证版本也。

一、书籍、书籍形态和书史的主要内容

谈到典籍或书籍，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顶多还能想到古籍的线装或包背装的内外形象，再久远的书籍就难以想象了。其实现代人通常所能想象的书籍，都还是正规书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规书籍的出现，不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很晚以后的事情，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很晚以后的事情。早期的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虽然算不上是正规书籍，但它们却为正规书籍的产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初期书籍的特定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的初期书籍。初期书籍多指档案性质的文字记录，没有固定的外部形态，没有向公众传播知识、阐扬思想的功能。正规书籍则不同，所谓正规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有意的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有物质形态，又具有意识形态。凡是书籍，无

论是初期书籍，还是正规书籍，都是人的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相划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以阶级、阶层相划分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及各个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阶级的色彩。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阶级意识，反映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阶级特色。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受阶级制约，还要受时代制约。中国古代各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隶制时代，固然与之后的封建制时代呈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折射在书籍里，也就使书籍带上了时代特色。

当然，同是一个阶级，甚至是同一阶层，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平生际遇的不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著作家，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情绪。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折射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个人的特色。

所以有人概括说，书籍一经产生，就会凭借其物质载体从人的主观意识中游离出来，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书籍是一种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就决定了书籍的内容，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妙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所包含的意识都具有独立的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一个方面，即书籍的意识形态。

人的意识传播的媒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所以当人们的某种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只要物化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另一个方面。

书籍构成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式等。

文字是书籍构成最基本的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产生书籍。文字不但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构成任务，也影响着书籍物质形态的内外状况。如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就使得中国书籍既可从右向左直行竖写、竖雕、竖排、竖印，并因此而形成中国书籍的右侧装订、书脊居右的特点；也可以从左向右横写、横雕、横排、横印，并因此而使中国书籍又具有可左侧装订、书脊居左的特点。而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法、俄、德等外国文字，就只能是从左向右的横写、横排、横印，因而也就只能左侧装订、书脊居

左，而决不可能是竖写、竖排、竖印和右侧装订。这说明，文字不但是书籍构成的前提条件，还影响着书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态。

文字除在人们的头脑里可以想象外，只要在客观上显现出来，就一定得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一定得有个载体的问题。而文字的载体，实际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世界上各个古老的民族在各自书籍（包括初期书籍和正规书籍）的发展进程中，都曾经采用过不同的制作材料。外国人先后采用过纸草、树叶、树皮、砖刻、蜡版、铜叶、铅叶、金叶、亚麻布、羊皮、犊皮，乃至人皮；中国人则先后采用过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石头、石片、玉片、摩崖、竹简、木牍、缣帛等。到人类普遍使用纸张来制作书籍，那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由于文字的载体不同，或者说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法，或者说是书籍的生产方法也不同。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直到全人类共同使用铅活字排版印书，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在纸张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前，不能想象书籍会用印刷的方法生产出来。同样，在以甲骨、石片、玉片为书籍制作材料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的方法来生产书籍，而不能也无法采用印刷的办法。古印度及南亚、东南亚一带以贝多树叶为文字载体来制作书籍，也只能用铁笔将文稿刻划在贝多树叶上，也不可能用印刷的办法生产出贝叶材料的书籍。可见不同的书籍制作材料，相应就有不同的书籍制作方法。

由于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形式，或者说是书籍的外部形态也不同。片片不甚规则的甲骨，其装订形式只能是中间钻孔串连；片片有规则的竹木简，便可以用绳子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可卷可折可叠；纸张兼具缣帛的柔软而更易成型，因而先是效仿简策、缣帛的卷子装，后又出现经折装、旋风装。待到书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即由手写转换为雕印，则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式彻底过渡到册叶式的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书籍构成的要素，或者说是由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不但是中国书籍史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古书版本鉴定不可或缺的知识。特别是其中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书籍的装帧艺术等，则更是古籍版本鉴定必备的知识。知道竹木简书编连装卷办法，就很容易了解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演变依据；知道竹木简书编绳形态与条简状态，就很容易理解帛书、纸书栏线的模仿意念；知道竹木简书简上标篇名下注书名的格局，就很容易理解许多宋版书卷端题名为什么仍然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历史渊源；知道书籍制作材料的演变过程，特别是知道书籍用纸的前后变化，就很容易掌握从用纸特点上鉴定版本的门径；知道什么时期盛行什么书籍装帧形式，就会从装帧上另辟鉴定版本的蹊径；知道中国书体源流及各时各地所宗所尚，也能获得鉴

定写本、抄本、印本的佐证；知道雕版印刷与活字版印刷的不同特点，就很容易获得鉴别一书是雕版印制还是活版印制的技能；知道中国书籍插图版画的插图形式、时代特点、地区风格，也能获得由此区分版本的能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一句话，关于中国书史的知识愈多，鉴定版本也愈得心应手。这就是本书以“史证编”开篇的理由。

二、中国书籍的产生、初兴与发展

中国书籍究竟产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什么时期呢？相传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恐怕靠不住。因为那时连文字都还没有，怎么可能会有书籍产生呢。《尚书·多士篇》中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讲的意思是，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成功之后，要把原殷的部分遗民西移至洛邑，这些百姓故土难离，不解其义，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于是周公出来训话，讲解道理。他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先人往世是有册书典籍的。那些册书典籍中记载阐述了殷革夏命的道理，你们应当案省而知之。现在殷王朝已被推翻，也是天命革殷，同殷革夏命时的道理一样，是天命所归。希望你们不要违抗天命，服从迁徙。这段话作这种解释如果是真的，则说明殷朝前期可能已经有了正规书籍。这可以说是我国正规书籍产生的历史上限。

相传孔子曾经删述六艺，证明在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确产生了正规书籍。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整个生活的时代恰是春秋末年。孔子一生除了行教之外，就是整理古籍。所谓删述六艺，就是他整理古籍的重要内容。六艺指的是《易》、《书》、《诗》、《仪礼》、《乐》、《春秋》。到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艺被尊为经典，所以又称六经。《乐经》久已失传，故又有五经之称。五经在西汉武帝时均立于学官，由此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既然说孔子删订六经，顾名思义，那就不是创作，而是编次订定。既然是编次订定，那就说明在孔子之前这些书籍早就有了基础，并且久已流行了。否则孔子依什么为底本进行删汰订定呢？事实也正是如此。传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致令“韦编三绝”。韦者，纬也。纬与经相对，经为竖，纬为横。“韦编”就是横编。古时以竹木简写书，编简之绳相对于竖写文字的条条竹木简来讲，恰是横编。故“韦编三绝”者，乃因喜读，经常翻阅，致使编连《周易》竹简的横向编绳都烂断多次，可见孔子是多么地喜欢《易经》。既然是孔子的喜读之书，不是久已产生，又作何解释呢？《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专著，在该书中孔子多次征引《尚书》和《诗经》上的话作为论据，阐述某种思想，说明某种道理。表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尚书》也早已成书行世，否

则他又何从征引呢？周景王元年（前544年），吴季札曾经到鲁国观乐。鲁国为吴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诗经》差不多。而吴季札赴鲁国观乐的那一年，孔子才只有8岁，表明远在孔子之前，《诗经》也早已成书流行了。至于《春秋》，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曾向许多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国主张，都遭到拒绝，不见重用，且曾被困陈蔡。“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次就是编次，既是编次，就说明在孔子之前《春秋》也早已草创成书了，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编次了。事实上鲁国早有国史，名字就叫《春秋》，孔子不过据此加以增删编次罢了。所有这些实例都能雄辩地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正规的册书典籍的确早已产生了。这可以谓之正规书籍产生的历史下限。

至于产生在春秋末期以前的这些册书典籍，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虽然无法具体确定，但也可以大体推知。殷商和周王朝的前期还属于“学在官府”的时代，中央天子和王国诸侯的周围都有史官，他们负责记言记行，保管文献档案等。因此，当时藏书、读书乃至编书、著书的权利，都只能属于这些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少数统治阶级贵族。这些人以外的一般人是无权问津的。所以，史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知识，又生活在贵族统治者周围，掌握着丰富的文献档案材料，这就给他们创造了极好的编书、著书的条件。孔子所删订的《六经》原著，很有可能就出自这些史官之手。

正规书籍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文明与进步，意味着知识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传播。所以到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过去那种少数人垄断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思想在社会内部孕育着、萌生着。待到孔子以教育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便响亮地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表明知识已突破少数上层人物的桎梏，向更广泛的士阶层传布。士阶层就是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书籍的初兴。

孔子之后，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十分脆弱，极不健全，极不成熟。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各申主张，这就是所谓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质是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是思想战线上不同哲学观点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都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战胜对方，弘扬自己，争取掌权者的采纳，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先秦诸子的这种活跃论争，产生了大批的私人著作，从而使我国书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书籍生产的第一个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都有著

作传世。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还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名家有公孙龙子、惠施；阴阳家有邹衍、邹奭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的《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此为战国时期书籍的初兴。

秦王朝来去匆匆，且行“焚书坑儒”政策，故书籍遭劫。秦朝自己的著作本来就少，且未能流传下来，所以秦代的书籍生产跌至低谷。

汉初，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前车之鉴，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一度曾遭受秦王朝严酷压制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如黄老学派、刑名学派以及儒家学派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提倡，出现了一批有见地的政治家和有成就的文学家。如贾谊、贾山、晁错、枚乘、邹阳、庄忌等，都是此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下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表明此期的书籍创作又趋于复苏。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本人又是个文治武功都想大有作为的人，这就与藩王出于政治目的而继续提倡汉初的黄老之学发生了矛盾。汉武帝则以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力量，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彻底结束。经过董仲舒改造和解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作品，成了官方哲学和经典著作。从此以后，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然也经受过各方面的挑战，但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因此，书籍的创作也受其钳制，常常围绕经学打转转。经注、经疏、经解、释音、释名、释义、名物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等有关经学的著作，层出不穷，历朝都有。这种经学的发展与经学书籍的迭兴，都可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中找到最初的源头。

司马迁《史记》的问世，开了我国后朝撰写前朝历史的先河，纪传体亦成了我国正史的基本体裁。此后封建王朝更迭不断，封建王朝的史书也赓续修撰，直至清末，竟有二十五史传世，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而紧跟历史的发展，还有大批量的史著问世。封建社会为什么如此重视经、史呢？盖“经禀圣裁，垂型万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见《四库全书总目》）。所以中国历史上正经正史向来产生得多，传抄刻印得也多，版本鉴定的任务也重。

他如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书籍、医学传统与医药学著作、道家传统与道教书籍、天文学传统与天文历算著作、兵家传统与兵书著作、释家传统与释教书籍、农业传统与农家著述、小说家传统与古今小说著作等等，真可谓浩如烟海，多如丘山。这些多如丘山的书籍，是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从最初仅有的六艺（即《六经》）发展到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犹如渊生细流、流成百川、百川汇海。这些浩繁的书籍，再经过历代多次传抄刻印，版本更为复杂。要想从这种纷纭复杂的书籍和书籍版本中理出源流系统，得出正确

结论，不知道一些学术发展的知识，不知道一些中国书籍产生、初兴和发展的梗概，那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因而中国书史也就更加灿烂辉煌。其间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生产材料、生产方法、装帧形式等，都有过极大的变化。不从源头说起，流别就很难说清楚了。

三、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一）书籍的生产材料

书籍实质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它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它的物质形态。而当意识形态要用文字加以表现时，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了。而文字的着附材料，或者说是文字的载体，从广义上说，就是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叫作书籍的制作材料。

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说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不是一开始就用纸张来书写或印刷的。纸书的出现，在书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纸书的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材料。

1. 纸书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材料

前边已经说过了，书籍有自己特定的概念和构成要素，不是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可以称为书籍。但书籍是从最初的文字记录，经过人的总结、规范、系统和逻辑加工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要谈书籍的生产材料，也还需要追根溯源地从最初的文字记录谈起。

纸书出现以前，书籍的生产材料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世界上一些文明较早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国最初的文字记录，或者叫作初期的书籍，是从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算起的，所以初期书籍的制作材料就是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玉、石质等材料。而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文字记载或阐述的不断加长，甲骨、青铜器或玉、石材料就难以承受或容纳了，于是又出现了竹木简书。而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了。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由后人整理墨家学派言论、著作而成的《墨子》中，多处涉及中国早期书籍的制作材料问题，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遗后世子孙，以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这里的所谓“书

之竹帛”，就指的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雕刻在金属的器皿上或石质材料上。

《墨子·尚贤篇》中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这是说古者圣王既懂得礼贤下士的道理，就把记载这种道理的书，象先王之书、吕刑之书那样书写在竹简、缣帛上，或者雕琢在盘盂上，以便传给后世子孙遵法借鉴。

《墨子·天志篇》中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罪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这是说古人将“爱人利人”的优秀品德，及“憎人贼人”的恶劣品质，都要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以供后世子孙弃恶扬善。

《墨子·非命篇》中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侍奉祭祀是很丰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便传给后世子孙。又担心竹简、缣帛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这些事镌刻在金属器具或石质材料上，或是雕琢在盘盂器皿上，以便传之久远。可见古人将什么事情书写在竹帛上，什么事情雕刻在金石、盘盂上，是轻重有别的。

《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是墨翟谈自己的感受，现身说法，申明自己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当时，更未亲聆其声、亲见其颜，但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呢？没有别的，就是靠阅读他们那时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石盘盂上的文字记载所知道的。

上述《墨子》书中的这些说法，虽然是墨翟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追述以前、描绘当世，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亦未尝不是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的确是，在墨翟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曾经有过金、石、竹、帛并行的时期。而随着书籍的产生和发展，竹、帛逐渐成了书籍生产的主要材料，并流行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还说：“断木为椠，枿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是说要把竹子截为一段一段的圆筒，再劈成若干竹片，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竹简。木料也要截成段，

开成板，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版牍。新竹带有青皮，不易着墨，含有水分，容易生虫朽蠹，需要经过加工处理才能使用。西汉后期刘向曾在他所作的《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可见古人在以竹木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不但懂得整治刮削，便利使用，而且懂得如何防虫避蠹，以利于书籍的保护。

现在“简牍”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竹、木简也常是相提并论。但在实际上，竹简之用于文字载体要早于木牍。或者说在竹简行用的启发下，没有竹子或不便于用竹简的情况下，木牍便以竹简替代物的身份充当书籍的制作材料，并与竹简同时流行。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从上述的文献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历来出土的实物也可得以验证。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共计16种。内容涉及史地、占卜、故事等。今传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就是这次盗发出来的竹简整理而成，并流传了下来。可惜这次出土的竹简书籍，其实物没能保存下来，但却足以证明竹简确曾是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

南朝刘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楚墓中也曾经出土过一批竹简书籍，文字是蝌蚪文，大约是公元前505年—前278年之间的书籍遗存。可惜这批竹简书籍也没能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古简，都是近年发掘出土的。

1952年，五里牌出土竹简37枚。1953年，仰天湖出土公元前四世纪竹简43枚。1954年，长沙杨家湾出土公元前三世纪竹简73枚。1972年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两座西汉墓先后出土竹简近千枚。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306—前217年）的竹简1100多枚。1977年，安徽亳州市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了《仓颉篇》、《周易》以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十多种竹简书籍。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湾墓出土西汉初期竹简1100多枚，是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遗籍。所有上述这些出土的竹简，都以实物的姿态，雄辩地证明竹简确曾是书籍普遍使用过的制作材料。

木牍的出土除中原外，以西北地区为最多。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中亚考察，在和田境内的尼雅古址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木牍，大约40枚。1906—1908年，斯坦因又先后两次来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废墟及稍东的酒泉，又得简牍千余枚，约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之间的遗籍。内容涉及文学、数学、历书、占卜及天文等资料。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进行发掘，得到大批的汉代简牍。先后来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的还有帝俄时期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及英国的斯坦因等。在破城子处发现木牍5200余枚，在红城子等处发现木牍3500余枚，约为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0年之间的遗籍。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郊区东汉墓中掘得385枚简牍，其中大多数是云杉木牍。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中又发现医药简牍92枚，多是松木和杨木。1972至1976